

國家認同差異性下之集體記憶框架 — 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後的年輕世代*

鄭得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摘要

捷克及斯洛伐克二個民族於一次大戰後共同建立國家，經過 75 年的相處（1918-93），二個民族和平分裂。分裂之後的捷克及斯洛伐克分別選擇不同路徑建構新的國家認同，斯洛伐克以「歐洲認同」做為國家認同的建構框架，捷克則比較強調「歐洲懷疑」。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年輕世代在新的國家認同架構下，傳承並建構了不同的歷史記憶。因此，新世代雖面對共同的「過去」，卻有不同的解讀。另外，在彼此間缺少地緣衝突及重大歷史爭議的情況下，捷克及斯洛伐克新世代並未因國家認同及記憶的差異化而將對方視為敵國。

關鍵詞：年輕世代、國家認同、歷史記憶、捷克、斯洛伐克

* 筆者感謝二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

壹、前言

歷史與記憶處理的對象同是「過去」(the past)，但如何定義「歷史」與「記憶」及區別二者間的異同卻不容易。英國學者 Keith Jenkins (2009) 認為「歷史」是當下社會對過去的建構，如此無異於法國學者 Maurice Halbwachs 將記憶置放在「社會框架」下，透過集體建構而再現「過去」的看法(1992)。因此「歷史」與「記憶」從社會建構的視角而言，可說是以當下的社會思惟去理解過去。如此而言，歷史與記憶又有何區別？Jenkins 提出歷史是一門專業的編纂學，個人對某歷史事件的理解及評價往往透過某專家的歷史專著，因此人們認知的法國大革命應是某歷史學者的論點，而非自己能回到事件現場親睹歷史事件後的描述。Halbwachs 主張記憶具有集體性，有別於心理學強調記憶的個體性，而集體記憶由「社會框架」形塑，社會框架即是外在於個人的參考架構，於是個人記憶參照了他人及外在環境而論述了過去。由此觀之，歷史闡釋的「過去」是專家與學科專業的文本，而記憶則為社會集體結構化「過去」後的認知。然而，歷史與記憶同是當下對過去的建構產物，只是建構「歷史」是個別專家的使命，而建構「記憶」則是集體的結果。

在威權體制下執政者建構「歷史」作為統治意識形態，其政治指導作用深植社會生活，過去冷戰結構下的歷史意識提供某種社會能動性及社會認同的凝聚力，歷史作用與社會密切結合，歷史作為集權者的統治工具，人民具有深刻的歷史感與歷史意識。在威權時代的歷史工程是現代主義理性建構的一環，是大歷史的鋪陳，強調正確、清晰及「科學」的社會指導作用。後威權時代的社會解構了前時代的強勢「歷史」，並讓出了不少空間提供「記憶」講述故事及訴求轉型正義，甚至在後工業、後現代或後結構思潮結合全球消費主義的盛行下，商品化了「記憶」，記憶產業化的結果讓懷舊創造了產值，歷史及記憶的定義因此在時代變遷中不斷被解構及再建構。今日的「歷史」不再單純做為統治意識形態，而是 Jenkins 所認定的歷史編纂學專業，提供人們認知及評價過去的線索，不過跟記憶建構類似的是，建構歷史往往亦是利用當下社會的參考框架。

後威權時代，不僅是記憶，歷史也與社會有了重新連結的關係，但不同於威權體制下歷史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模式，Jenkins（2009）認為歷史學就是某種社會建構，意即歷史論述過去，但不等於過去。Peter Burke（2002）也利用社會學理論來檢測「新史學」的發展，他主張以社會學概念及社會學提供歷史研究方法的關聯）。不同於傳統史學論述與史學方法，新史學強調科際整合，結合社會科學方法論及資料蒐集方法，來論證歷史建構的觀點。19世紀社會學的奠基者如孔德、馬克斯及涂爾幹等人，即以科學實證結合歷史研究作為社會變遷與社會秩序的探索方法，歷史社會學是社會學傳統的重要分支。在後威權時代，歷史學家以當下社會架構書寫過去的專制歷史，然而社會大眾同時也在書寫著自己的集體記憶，歷史學家與社會大眾以各自的方式論述過去、再建構過去。面對20世紀以來的世界史變化，當代新歷史主義或新史學往往藉由文化或社會理論不僅來檢視民族的離散（diaspora）與創傷（trauma）經驗。另一方面，微觀史學探索著後現代碎裂的日常生活史。「歷史記憶」的學術命題似乎不存在著歷史（歷史學）及記憶（社會學）的學術分工，而是歷史學與社會學的共同學術使命。

本篇是探討歷史記憶的論文，研究方法是實證的問卷調查法，舉的個案實例是位在中東歐地區的二個國家：捷克及斯洛伐克，探索的對象是他們的年輕世代，研究問題是探討國家認同與歷史記憶建構間的關係，主要論點是採用民族主義現代派的觀點，亦即國家認同是導引歷史記憶建構的社會框架，先有民族主義，而後建構民族，民族主義是民族建構的框架。民族血統、語言文字、地緣親近及生活習慣等要素是民族建構的必然要件，但並非充分條件，一旦國家認同或民族主義論述形成，歷史／記憶論述進一步成為民族國家鞏固的基礎。然而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形塑是受制於政治導引力量，而不單只在於民族情感等訴求（參考 Anderson 及 Gellner 的論點）。以上論述是傳統的民族主義現代派的建構觀點，這觀點反對民族主義的原生論，本篇論文首先以歷史回顧的方式探索20世紀捷克及斯洛伐克分合的歷史格局，其次再以此歷史格局中的記憶傳承說明捷克及斯洛伐克年輕世代的歷史觀及國家觀，最後再以實證資料導引出在國家認同差異性下不同的集體記憶框架，而此記憶框架形塑了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後

年輕世代的歷史記憶。

本文所指的歷史記憶是集體記憶所屬的範疇，本研究的調查對象為出生及成長於民主革命後（1989）的年代，他們並未參與捷克及斯洛伐克共產統治時期的社會生活（1948-89），因此他們對過去的認知主要來自正規教育下的歷史與相關課程，以及家庭成員的互動或各種媒體的社會傳播作用等。年輕世代透過這些管道傳承及分享當下社會的集體記憶，或甚至能動性地建構屬於自己的新世代記憶。年輕世代透過多元管道傳承、學習及了解過去及歷史，這種民主化的學習過程有異於年長世代的歷史教育，因此年輕世代對過去的認識主要是來自民主化的歷史教育及社會化的過程，而這樣對「歷史」學習的內容與方式構成了他們的歷史記憶或歷史意識。本文主要探討中東歐後共產時期的新世代，如何藉由國家再建構的歷程來傳承其國家認同及歷史記憶。

貳、理論與歷史分析

本文以捷克及斯洛伐克為例，論述其歷史／集體記憶如何由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這個參考架構形塑而成。二國的國族記憶與歷史意識息息相關，20 世紀初（1918）捷克民族及斯洛伐克民族決定共組國家，20 世紀末（1993）又決定分家，20 世紀當中有 75 年是捷克民族及斯洛伐克民族的和平相處，不管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或是分裂後的捷克共和國及斯洛伐克共和國，都是嶄新的民族國家及相異的國族認同架構。Anderson（2010）及 Gellner（2001）等學者都主張民族主義決定／先於民族的存在，國族／國家認同是民族主義的核心目標，亦即國族想像共同體終究期望製造出獨立且擁有主權的國家，歷史記憶／國族記憶接著做為鞏固國家主體性及國族／國家認同的凝聚力量而存在。集體記憶是人民社會生活的直接產物，記憶產自於人們對過去生活的直接感受或認知，或從社會生活中傳承所獲得的理解。歷史論述可以提供集體記憶形成的參考，因而形構民族的歷史記憶，亦即對過去重大事件的共同情感與看法。歷史專業知識有其特定範疇，無法取代集體記憶的社會作用，人們從「歷史」中形構出來的

集體記憶，是依據人們實際社會生活的感受而來，因此集體記憶中的歷史意識主要仍是來自當下的社會架構。

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絲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讓共產政權解體，但同時也加速了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的進程。二個民族在20世紀初透過自由意志共組民主政體，結果也在20世紀末恢復民主政體之後，再度透過其自自由意志決定二個民族分裂各組國家。在民主政體下，自由意志可以創造不同的歷史可能性，1989年前後出生的捷克及斯洛伐克新世代，即在民主化、全球化及市場化下的社會環境／社會架構，並在去捷克化或斯洛伐克化的脈絡下單純地接受單一國家認同。相對於年輕世代的國族記憶或歷史記憶，年長世代的國族認同需要轉換，或甚至堅持原有的國族認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不管轉換或堅持既有的認同，結果都影響到其記憶是否會改變，因為個人記憶會受其所在的社會或相處的他人影響，最後很可能不是記憶去決定何種認同，而是認同決定了記憶是否會改變。然而本文受限於主題範疇，研究重點僅在探討捷克及斯洛伐克年輕世代的歷史記憶與其國族認同的關係，本文論點認為由於國族認同明確，捷克及斯洛伐克年輕世代的歷史記憶不似年長世代的複雜，也比較不具有舊國族認同的情感糾結，這樣明確的國族認同及歷史記憶促進二國年輕世代對未來國家發展的期待，以及二國分裂後的和平相處。

一、集體記憶

法國學者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提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 的概念說明記憶的集體性與社會性 (Halbwachs, 1992)，其有別於心理學談論個人經驗的記憶，個體層面的記憶如缺乏結構、連續及規則性的夢境，是支離破碎而無法連貫一致地支撐個體對過去社會生活的整體建構，因而記憶是植根於社會脈絡及社會結構下而又受社會制約的關連性結構 (Cosser, 1991: 28)。Halbwachs 認為只有個體才能記憶，而集體記憶是指個體在所處的團體脈絡下，與其他個體或群體的互動聯繫所產生的集體意識，因此要理解集體記憶，必須要釐清個體在團體的社會情境及位置，集體記憶是社會互動的產物，唯有從團體脈絡下才能獲得個體的記憶及其

意義。所謂的團體脈絡就是社會框架，個體記憶藉由社會框架顯現意義，並延續記憶的存在。不過社會框架會隨著社會現況而改變，個體並非無拘無束地回憶過去，而是受社會框架的時空限制，在既有的框架下對過去進行回憶。

社會框架不是一成不變，主要受當下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Halbwachs (1992: 93-94) 指出親屬關係是分析家庭記憶時的社會框架，親子關係及其互動方式內化成為家庭成員的記憶內容，同時隨著社會現況的改變而解讀社會框架的不同內涵，也由此獲得家庭記憶的現代意義。Halbwachs (1992: 200) 認為宗教記憶並不是在保存過去，而是透過重複過去的儀式與傳統，試圖將過去與現在聯繫在一起，而主要的社會框架是依據當前的社會關懷，並借助晚近的心理和社會資料，重構了過去，讓宗教記憶在社會與歷史脈絡中尋求定位，因而強化了宗教的正統性。Halbwachs 認為缺乏「社會框架」，「集體記憶」是無法被完全理解的。社會框架的選擇讓集體記憶的建構具有政治性，而集體記憶則以某種歷史敘事模式闡述其意義，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集體記憶是能被傳承、分享及凝聚行動力，個體記憶在集體記憶的群體脈絡及社會框架下獲得實踐意義並延續記憶的生命力。

社會框架是建構集體記憶的外在參考，參考框架的不穩定性使得集體記憶不斷被重新組合及改造，以適應目前時空變動下的需要。蕭阿勤認為集體記憶是一種「透過敘事化而將人們對過去的理解模式化、結構化的過程與結果。」(蕭阿勤，2008：38) 集體記憶是依靠敘事 (narrative) 形成的，經由敘事化的過程，一連串的事件被編排進有意義的結構中，從而成為一個提供集體認同的來源。敘事並不是對現實事件照單全收的單純反映，同時也包含了選擇、重組與簡化的過程。而敘事創造意義的方式就是「將經驗或事件納入特定的情結，使它成為別的經驗或事件的原因或結果，也因此成為更大的一個關係整體之一部份。」(蕭阿勤，2008：38) 這顯示出集體記憶的形成過程中，容易受到權力者之文本論述的影響，甚至是有目的性的建構。這樣的建構在現代的社會中往往是刻意的虛構 (invented) 或甚至刻意的遺忘 (forgetting)。在集體記憶中，歷史細節不

再具有必要性，當下的信仰與共同經驗才是形成集體記憶的充要條件。另外，Aleida Assman（2008: 49-72）認為個體記憶可以藉由敘事、圖像及語言與外在符號系統互動，因此有助於記憶建構的視覺或語言上的符號、教育機構與大眾媒體的宣傳、可接觸的紀念館或遺址及固定週期舉行的慶典儀式等，都能將個人短暫的對社會事件的記憶轉化為長期的、能世代傳承的集體記憶。超過自己生命或生活經驗的重要歷史事件，則通常藉由教育、傳媒、慶典儀式或古蹟建築等意義化，而延續集體記憶的歷史作用。

綜合以上，集體記憶是建構在某種社會框架的參考上，但由於框架的時空變動性，因此集體記憶並不穩定，社會框架往往是透過當下社會脈絡的選擇及敘事化，往往具有特定的意識形態及政治作用，有權者甚至利用虛構及遺忘等方式創造集體記憶。集體記憶也是個體與群體間對過去的集體認同，這種記憶與認同來自於社群與外在符號系統互動之中，而想像出來具有內在凝聚力的共同體（community）。集體記憶正因來自個體的社會互動中，這種社會經驗是具體而鮮活的，所以每個個體皆是言說者，然而超過個體生活經驗的部分，則是以教育及社會化媒介將個體與集體記憶的歷史作用做連結，尤其對過去重要的歷史事件，其社會作用可能延續至當下的社會環境中，例如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自由化運動做為 1989 年絲絨革命對抗本國共產政權及蘇聯外來勢力的民主化與民族運動的重要論述及反抗精神代表。

二、年輕世代與歷史意識

學者蕭阿勤認為「世代」（generation）觀念主要來自於 Karl Mannheim，然而 Mannheim 並未對這個詞彙下明確的定義，僅強調特殊世代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影響如何作用在年齡團體上，而不是將生物學上的年齡簡單地當成解釋工具。Mannheim 指出當某事件的發生影響到了某群人的「歷史—社會」意識形成，即可指認其為「一個真正的世代」（蕭阿勤，2008：21）。此種觀點類似馬克斯對無產階級自覺意識的看法，亦即當無產階級具備階級意識後，才能從自在階級轉為自為階級。Mannheim 則認為具有世代意識的某年齡團體，才能稱之為真正的世代。Mannheim 指出

個人世代意識的形成大約是在 17 歲左右。後繼的研究者也認同青春期的晚期與成人期的早期是形成個人政治態度的主要時期。Bourne 更是早在 1911 年就寫道：「即便是最年輕的世代，除非環境發生重大的改變，他們直到 25 歲後才會得到真正的新的經驗。」（Hazlett, 1992: 81）

因此，Mannheim 對年輕世代是否存在的依據主要來自於某年齡團體（年輕人）在特殊時代中是否具有世代意識的評斷。Mannheim 也強調在童年時期，尚未有任何自我覺醒（self-awareness）的意識形成，此時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行為及其元素所組成的「自然世界」（natural world），此自然世界即形成「無意識的世代效應」（unconscious cohort effect）。世代意識往往是對特殊時代脈絡下的社會認知，而此種認知常具有深刻的歷史意識作用，透過對歷史發展脈絡的感知而賦予世代某種時代使命，對年輕世代而言，世代意識往往建立在特殊時代中對歷史意識的深刻感受，年輕世代可能未親身經歷重大歷史事件，但由於身處特殊時代或本身認知為特殊時代，因而主動連結歷史脈絡下的時代意義。年輕世代透過歷史意識的社會框架建構其當下社會的世界觀，以及經過歷史意識的傳承而建構成年輕世代的集體記憶或歷史敘事。

一個世代的集體經驗及記憶透過歷史學者或官方的編撰，而形成歷史論述及一門專業學問（歷史學），並經由教育、政治及社會各種機構之權力運作下，而形成不同之歷史意識及集體記憶框架。年輕世代經由不同途徑參考以上所述之框架，而形成其歷史記憶與認同。對 1980 年代末出生於中東歐的人而言，這是一個大時代，而這樣的時代格局並非稍縱即逝，至少延伸到 2004 年（或 2008 年）有十個前共產國家加入歐洲聯盟，這樣的時代變遷至今仍可能尚未停止。如以捷克及斯洛伐克為例，歷經 1993 年的國家分裂，以及往後捷克及斯洛伐克各自為加入北約組織及歐洲聯盟而努力，成長於革命後的年輕世代對國家認同及歷史記憶的建構有很不一樣的歷程。基本上他們的國家認同已分別來自獨立的捷克共和國及斯洛伐克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集體記憶已逐漸解構成國家分裂的必然走向，除了老一輩的捷克人及斯洛伐克人對其曾共有的歷史記憶及文化遺產仍相當留戀之外，隨著分裂後的國家發展日趨鞏固，強烈的國家認同意識

強化了各自集體記憶的重構，類似 19 世紀的文化民族主義建構歷程某程度地再現於 20 世紀末。歷經 19 世紀及 20 世紀的建國運動，捷克及斯洛伐克人民的歷史意識及集體記憶強化了目前國族認同的建構框架，依目前的政治情勢來看，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國家分合應該大致底定，很難再統一成為同一國家。

三、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

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年輕世代生活在新世代，然新世代仍是一個變動不居的大時代環境，這個新時代離舊時代尚未久遠，且其生活周遭仍有許多有共產時期生活經驗的人，透過記憶傳承，新世代仍可繼承及分享共產時期的集體記憶，不過由於社會框架的內涵已有變動，年輕世代在民主化、市場化及全球化的參考架構下，對過去的理解是具有未來性的。比如說，在後共產時期作為年輕世代記憶框架的社會格局有「去東歐化」、「去蘇聯化」、「回歸歐洲」、「歐洲認同」等時代趨勢，2003 年包括捷克及斯洛伐克等中東歐八個前共產國家，紛紛舉辦加入歐洲聯盟的公民投票，最常出現的標語口號是「爲了下一代著想」。民主革命後的中東歐對新時代的論述是建立在加入歐盟的願景上，因此他們放棄冷戰時期堅持的共產國際認同，維斯葛拉德集團（Visegrad Group）國家（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努力洗刷「東歐」的汙名化，而不遺餘力對外宣稱其爲「中歐」的地理、歷史及文化的歐洲性。民主革命後中東歐的社會變遷快速，也形成了失落的一代，不過他們指的是年長的世代，而非新世代，年長者帶著舊思維及舊技術進入新時代，社會福利變少了，工作機會必須要競爭，全球化及市場化帶給他們諸多不利，他們懷念過去，於是某程度形成了世代差異的社會態勢。但懷舊並未真正化爲回歸共產的運動，中東歐年長者的失落感更多表現在生不逢時的感嘆，他們與年輕世代在互動中傳遞了他們的集體記憶，並強化了年輕世代的未來前瞻性。

本文以「國家認同／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作為捷克及斯洛伐克年輕世代集體記憶建構的社會框架，他們如何藉由新的參考架構想像自己的民族國家，並在新國家的建立後共同參與歷史記憶的重構，而從中獲

得歷史意識及意義。極端的民族主義在現今的歐洲具有高度爭議性，但其存在是事實，儘管歐洲整合的進程不曾停止，歐盟國家藉由一些條約（『馬斯垂克條約』、『申根條約』等）試圖消弭國與國之間的邊界，最終目的是政治整合，甚至統一成爲一個政治單元。不過觀諸歷史，近代歐洲是處於不斷分裂的過程，1989 年之後首先是南斯拉夫的解體，波羅的海三小國脫離蘇聯獨立，捷克及斯洛伐克也於 1993 年和平分裂，巴爾幹半島上的科索沃獨立爭議等，甚至包括西班牙、英國及法國境內都有分裂主義團體及分裂思想的存在。歐洲整合無法消除會員國的國族意識，甚至重大議題上仍可看出會員國之間的利益衝突，「歐洲」、「歐洲性」、「歐洲整合」、「歐洲人」及「歐洲認同」等同質概念都可以用來強調歐洲的基督教文明、民主國家、自由市場等基本價值，但自古以來歐洲國家的衝突根源所在，即地緣政治及國家利益的考量從未真正消失。從 19 世紀中東歐民族主義盛興至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斷分裂的歐洲，儘管二戰之後歐洲整合計畫的推進，歐洲分裂仍伴隨著歐洲整合併進，而從未真正停止。在歐洲分裂及整合的歷史脈絡中，分裂往往透過戰爭或衝突結果而定，整合則需靠外交政治折衝，然而像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分裂是透過和平談判，此種分裂個案相當少見，因此史稱「絲絨分裂」（Velvet Separation），是繼 1989 年「絲絨革命」之後的另一創舉。

捷克及斯洛伐克人同屬西斯拉夫民族，其血統、語言、文化、生活習慣、地緣等具有高度相近性，不過 10 世紀位處斯洛伐克及摩拉維亞的大摩拉維亞帝國被馬札爾人吞併，自此長達 1,000 年左右被匈牙利統治。波西米亞（捷克）公國／王國起於 10 世紀，興盛於 12 世紀之後，14 世紀在查理四世擔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並於布拉格爲帝國首都期間，波西米亞王國的國力達於頂峰，15 世紀耗於內鬥，16 世紀（1523）波西米亞王冠落入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自此至一戰期間，捷克被奧地利統治長達近 400 年。捷克及斯洛伐克的歷史幾乎是在各自的發展脈絡進行，斯洛伐克的種族、血統及語言等民族特性與馬札爾差異甚大，波西米亞與日耳曼民族亦然，19 世紀的中東歐文化民族主義或民族復興運動在捷克及斯洛伐克境內也各自進展，斯洛伐克要對抗的對象是匈牙利，捷克則爲奧地利。儘管捷克及

斯洛伐克在許多民族特性上有許多親近性，但歷史的現實讓二個民族在過去未能產生交集。從歐洲歷史脈絡來看，「19世紀」的真正意涵應結束於一次大戰之後（1918），19世紀中東歐民族主義在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計畫下，獨立了許多新興的民族國家，此時在捷克政治家馬沙理克（T. G. Masaryk）的號召下，捷克與斯洛伐克的政治菁英在美國簽訂了『匹茲堡條約』（1918），確定在戰後合組一個國家，首都在布拉格，名稱爲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馬沙理克擔任第一任總統。由於民族特性及歷史命運的親近性，捷克及斯洛伐克民族共同慶祝了一個新興民族國家的成立，性質是聯邦制的民主國家¹。

從1918年捷克及斯洛伐克民族共同建國的歷史來看，首先是政治性考量建立國家，產生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再以此作爲民族論述框架，建構出了新的民族——「捷克斯洛伐克」人，這不僅是國民身分，也是新的民族想像及文化認同。捷克及斯洛伐克政治菁英之所以在1918年決定共組國家，主要考量不脫地緣政治因素，儘管一戰之後的帝國格局將會消解，但僅以捷克及斯洛伐克各自獨立後的實力而言，仍無法立足於中歐地區，這是馬沙理克在帶領捷克及斯洛伐克兵團時的感受，於是透過在美國的捷克及斯洛伐克移民菁英的議決，戰後合組國家。捷克及斯洛伐克政治菁英的決定並未透過人民全體的同意，於是1918年10月28日新國家成立，歷經數百年的封建體制，人民被動但欣然接受這樣的安排。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革命之後，捷克及斯洛伐克政黨政治的變化影響國家是否分裂的意向，導致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分裂的仍是政治菁英分子，雙方皆未辦理全民公投，不少堅持捷克斯洛伐克國家認同的人無法接受這種政治決定，但分裂形勢已成定局，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爲有史以來的新興民族國家。

1993年的歐洲局勢不同於1918年，一次大戰之後的歐洲仍是縱橫外交

¹ 本文有關捷克及斯洛伐克的歷史參考文獻，見 Agnew (2004)、Berend (2003)、Cornej 與 Pokorny (2004)、Dowling (2001)、Kirschbaum (1995)、Leff (1997)、Mannova (2000)、Musil (2000)、Panek 與 Tuma (2009)、Polisensky (1991)、Wandycz (1992)、以及 Ward (2000)。

與地緣政治的不穩定狀態，捷克與斯洛伐克的結合是國家的理性選擇，1993 年的歐洲是冷戰結束，並提倡歐洲整合的和平時代，歷經 75 年的民族國家磨合，此際選擇分離從結果論來看似乎是合理。本文針對年輕世代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他們的歷史記憶主要傳承於長輩及教育，但他們的生活記憶一開始即建構在去捷克化及去斯洛伐克化的基礎上，民主化之後已歷經 20 年，我們想檢驗年輕世代在國家認同的框架下其歷史記憶的差異性。基本上他們擁有共同的過去，但在不同的國家認同下是否對共同過去有了不同的理解，這也進一步論證國家認同建構了歷史記憶的內涵。1918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是新國家，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在文化融合上的問題不大，彼此語言能通，生活習慣相近，但歷經 19 世紀民族復興運動的影響，各自仍有民族自尊的感受，雙方結合期間的衝突往往來自民族尊嚴的理解不同。建國之初，捷克協助斯洛伐克建立各種典章制度及管理系統，這被斯洛伐克人解讀為新宗主國；二戰期間斯洛伐克政府與納粹德國合作，被捷克視為叛國；1968 年布拉格之春運動在斯洛伐克的反響遠不如捷克，之後的正常化運動是斯洛伐克人 Gustav Husak 任總書記，捷克人普遍覺得比斯洛伐克受到更大的壓抑；民主革命後，Vaclav Havel 被選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他以和平倡議關閉斯洛伐克近 20 年發展不錯的軍火工業，造成大量失業，斯洛伐克人覺得又被捷克壓制；捷克及斯洛伐克從結合開始，即不斷在國名設定上做文章。本文透過捷克及斯洛伐克作為個案探討，以此來理解歷史記憶的建構如何在國家或國家認同的框架下形成。

參、研究方法與樣本

本研究主要採取問卷調查法研究捷克及斯洛伐克年輕世代的歷史記憶，年輕世代的操作定義是選取在學的大學生及研究生，為何只針對學生進行研究？在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反抗運動史裡，學生經常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 1938 年納粹德國侵略捷克引起學生示威遊行，結果導致多名查理大學的學生遇害。1989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絲絨革命即是學生做為發起前鋒而最終導致全民的參與，並推翻共產政權。民主革命之後，捷克斯洛伐

克政府即將 11 月 17 日訂為國際學生日，以紀念學生的勇敢行爲。Mannheim 認為一個世代的真正形成是具有其自爲的歷史社會意識，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學生在大時代裡的世代意識是被廣泛認同的，所以本文主要以大學生做爲年輕世代的研究對象基本上是有世代代表性的（蕭阿勤，2008）。另外，1993 年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之後，各國內部族群分布大都以本國族群（捷克人及斯洛伐人）爲絕大多數，約占九成以上。因此，本抽樣並未針對少數特定族群在進行特定分類，以求探討其國家認同架構之差異。本研究的問卷調查是由本文筆者委託捷克及斯洛伐克各一位碩士級之研究助理代爲執行，施測期間主要於 2010 年 9 月至 11 月間，抽樣的方式是以隨班課堂上發放問卷的形式進行，此研究爲非隨機抽樣，由於本研究屬於探索性之量化研究，並未深入探討變項間之因果關係，又由於爲跨國研究，因此本研究未能施以最嚴謹之隨機抽樣，然本文目的亦非在推論性解釋，因此統計分析的目的在於描述性成果的論述，而非因果關係的檢視。雖有鑒於上述的抽樣限制，然本研究以跨國指導執行的資料蒐集方法，所得其分析結果仍是具有某種程度的參考價值，且其實證資料足以證明本文所提之論點²。調查方式主要以自填問卷的形式進行，共計獲得成功樣本 502 案：捷克 201 案及斯洛伐克 301 案，二國經過非隨機抽樣所得之樣本數，最後成功樣本數皆夠大，因此本研究資料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² 筆者在此回應其中一位匿名審查老師對本研究方法所提供的寶貴意見。本文的調查研究是跨國的實證資料蒐集，困難度相當高，資料搜集是透過筆者長期於中東歐耕耘學術人脈的結果，所以資料得來不易。本文最大的研究限制是無法做到隨機抽樣，及其推論統計的成果，儘管如此，在本研究樣本夠大（N=502）的情況之下，應仍能進行描述或探索性研究之參考。是故，本文並未能進行因果關係的解釋性研究，此爲資料性質所致，是否有交叉分析並非是因果關係的必要途徑，在本文亦不需要統計上的顯著性（檢定），因爲本文無法進行推論統計之分析。本文屬於探索性研究，而非因果關係的解釋性研究，因此強調自變項與依變項的因果關係，並非本文的研究目的，反而是本文的研究限制所在。在此感謝匿名審查者的指教。

表 1：捷克及斯洛伐克受訪者的基本描述

	捷 克 (%)				斯 洛 伐 克 (%)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大學年級	12.4	6.0	15.9	3.0	20.6	17.6	30.1	2.0
	碩士生	8.0	54.7	3.7	26.0	3.7	3.7	3.7
性 別	男生	44.8	55.2	44.8	男生	74.4	25.6	74.4
成長地方	首都	13.9			首都	26.6		
	首都以外的大城市	21.4			首都以外的大城市	17.9		
	中小規模的城鎮	48.3			中小規模的城鎮	42.2		
	鄉村	16.4			鄉村	13.3		
社會階層	上層	1.0	23.4		上層	18.7	1.7	
	中層	62.7	9.5		中層	7.7	69.0	
	中下層	0.5	0		中下層	2.7	0.3	
	下層	0			下層			

樣本性質描述如下(表 1)：捷克的大四生及碩博士生受訪者比例較高，約占六成三；斯洛伐克大一至大三的受訪者比例為 68.3%，大四及碩博士生約為 31.7%。受訪者的性別比例分別為：捷克的男性受訪者為 55.2%，女性為 44.8%；斯洛伐克的男性受訪者為 25.6%，女性受訪者比例較高，為 74.4%。受訪者的生長環境：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受訪者大部份都是住在中小規模的城鎮及鄉村（捷克為 64.7%，斯洛伐克為 55.5%）。此外，捷克及斯洛伐克皆約有七、八成以上的受訪者都自認為其家庭社會階層為中層（中上層、中層及中下層）。

肆、分析結果

本文以實證調查的結果及描述統計，來說明捷克及斯洛伐克年輕世代有關國家認同及歷史記憶的現實狀況，而基本假設是認為雖然捷克及斯洛伐克曾經為同一國家，但由於年輕世代生長在不同國家認同的社會框架上，其歷史記憶亦有所差異。1989 年民主化前後出生的一代，目前大致是

上大學的時候，他們出生時代的背景成爲他們國家認同及歷史記憶的重要參考架構，在捷克及斯洛伐克歷經 75 年的磨合後，最終以和平分裂收場，這樣的結果在全球化、民主化及市場化的社會變遷中，強化了各自的新國家認同，也在此認同脈絡下再建構了其歷史記憶以強化其認同。1993 年絲絨分裂之後，捷克及斯洛伐克各自爲加入北約組織及歐洲聯盟奮鬥，年輕世代幾乎是在一個全新的時代下生長，捷克及斯洛伐克可謂從過去的兄弟情誼而成爲現在好鄰居的寫照。以下的實證結果是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捷克及斯洛伐克年輕世代的真實想法。

一、年輕世代對國家認同的看法

1993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是重大歷史事件，正如 1918 年捷克及斯洛伐克民族贊成合組國家的情形類似，都是政治菁英份子之間決定的事，1993 年社會民眾雖對國家前途有一定的認知，但分裂之後的社會氛圍仍是普遍不捨。1990 年代的中東歐國家極力撇清與蘇聯的連結，並以回歸歐洲的新認同及加入歐洲聯盟做爲未來政治方向，不過斯洛伐克由於得利於布拉格之春運動之後共產政權全力發展重工業或軍火工業的經濟建設，因此前共產黨仍在民主時期獲得民眾的支持而持續執政至 1990 年末，這是在中東歐國家中比較特殊的例子，亦即民主化的斯洛伐克仍由與前共政權關係密切的政黨執政。不過也因斯洛伐克的民主改革不彰，而受北約組織及歐洲聯盟的抵制入會申請，1990 年代末 Vladimir Meciar 政權下台，接續的 Mikulas Zurinda 政權大幅度改變爲親歐美政策，經濟大爲發展，回歸歐洲的速度加快，最終才得以陸續加入北約及歐盟。在 21 世紀初的政治經濟發展格局及社會快速變遷之下，斯洛伐克似乎找到了以歐洲認同做爲國家認同的新建構框架，在總理 Zurinda 大力招收外國資本之下，斯洛伐克成爲歐洲的汽車工廠及許多製造業重地。

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也從捷克斯洛伐克的格局走向歐洲認同，斯洛伐克的年輕世代有較高比例的回答是以我是歐洲人爲優先選項考量（參考表 2）。斯洛伐克以歐洲認同的框架來取代舊有的捷克斯洛伐克認同架構，讓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附屬於歐洲認同之下。相對於斯洛伐克的作法，捷克

的國家認同途徑差異甚大。捷克曾有過光榮的歷史，19 世紀民族復興運動的獨立建國方向明確，雖與斯洛伐克有短暫結合的意外歷史，但捷克人對自己的國族認同較有自豪感及自尊，他們不存在國族認同的框架問題。所以從表 2 很清楚地看出，失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框架，斯洛伐克主要以歐洲認同來取代，捷克仍是以國家認同為主，這或許在捷克人的思維裡，捷克即足以代表捷克及斯洛伐克整體，而這也是讓斯洛伐克欲脫離捷克宗主國想像的推力。

表 2：請問您的身分認同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我是捷克人 (斯洛伐克人) ，也是歐洲人	53.0	14.8
我是捷克人 (斯洛伐克人)	31.3	18.1
我是歐洲人，也是捷克人 (斯洛伐克人)	10.1	40.9
我是歐洲人	4.0	17.8
不知道	1.5	4.0

斯洛伐克以歐洲認同的框架強化了本身的國家認同想像，因此斯洛伐克加速了「歐洲化」，不僅在 2004 年與其他七個前共產國家加入歐洲聯盟，2007 年加入『申根條約』，更在 2009 年繼斯洛維尼亞之後成為加入歐元區的第二個中東歐國家。斯洛伐克的歐洲化速度雖然有高失業率及製造業污染等問題，但其整體經濟發展仍讓年輕世代著眼於未來及歐洲，不再只限於斯洛伐克境內發展，也因此他們有更強烈的歐洲認同，同時也強化了他們認為 1993 年與捷克分裂的正確性，從表 3 可以看出來高達 96.4% 的受訪者贊成分裂。相對於斯洛伐克年輕世代的看法，捷克受訪者贊成分裂的有 65%，少斯洛伐克 31 個百分點左右。捷克在歐洲地區是有名的歐洲懷疑論者，在捷克境內有相當高的比例並不贊成捷克融入歐盟的速度要加快，在捷克前總統 Vaclav Klaus 的帶領下，捷克有不少人認為歐盟只是個經濟合作的平台，各國的歷史文化無法在歐洲認同架構下消弭，所以我們從表 2、表 3 或甚至表 4 都能看出捷克的國家認同比起斯洛伐克而言，比較少認同歐洲化的現象，而捷克亦未有明顯的國家認同問題。

表 3：請問您對 1993 年捷克與斯洛伐克分裂的看法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非常贊成	45.0	60.5
贊成	20.0	35.9
沒意見	16.0	2.0
不贊成	12.5	0.7
非常不贊成	5.0	0.7
不知道	1.5	0.3

表 4：您認為目前國家認同問題是否嚴重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非常嚴重	1.5	74.3
嚴重	25.0	8.0
普通	41.5	16.0
不太嚴重	17.5	1.4
非常不嚴重	7.0	0
不知道	7.5	0.3

捷克及斯洛伐克擁有共同的過去及相同國家認同的歷史經驗，但在 1989 年民主化及 1993 年絲絨分裂之後，二國的國家認同方向有了相當不同的前進路徑。捷克的國家認同從 19 世紀以來維持的方向大體不變，這是因為捷克國族的歷史脈絡比較清晰，斯洛伐克的國家主體性一直飄搖不定，以致其國家認同框架在不同時期有不同選擇，甚至也有人重新檢視 1939-45 年與納粹德國合作的 Tiso 政權。表 4 的調查結果顯示斯洛伐克受訪者認為國家認同問題非常嚴重或嚴重，比例竟高達 82.3%，反觀捷克只有二成六的受訪者認為非常嚴重或嚴重，這樣懸殊的比例顯示斯洛伐克年輕世代以歐洲認同的框架來建構國家認同仍有很高的不穩定性。不同於冷戰時期的國家主體性受制於蘇聯共產國際的影響，後冷戰的地緣政治結構是否可能

以歐洲聯盟取代前蘇聯左右國家主體性，這是前共產國家在回歸歐洲與高揚歐洲認同的思想上所擔心的問題。斯洛伐克以歐洲認同做為國家認同的建構框架，實際上也承擔著國家認同及主體性受損的憂慮，所以表現在表 4 的結果正說明了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危機。

二、年輕世代的歷史意識

前文論述了捷克及斯洛伐克年輕世代的國家認同建構，接下來再來探討年輕世代在此國家認同框架下的歷史意識及記憶。從上述的國家認同來看，斯洛伐克的年輕世代嘗試以歐洲認同的框架為國家認同注入新的想像元素，因此我們在調查問卷中間了二個重要的歷史問題（表 5），第一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絲絨革命是哪一年，及第二個問題是捷克及斯洛伐克的第一位總統是誰（1918），這二個問題應是簡單而重要的歷史常識。我們可以看出捷克受訪者在第一個問題上答對的比例與斯洛伐克差不多，然而斯洛伐克受訪者對第二個問題答對的比例僅為六成二左右，在捷克幾乎大家都知道是馬沙理克。當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從捷克斯洛伐克跳脫到以歐洲認同脈絡下的國家認同，如此重要的歷史問題在很多年輕世代的想法裡似乎就不再那麼重要了，何況是第一位斯洛伐克的總統還是捷克人，這也顯示斯洛伐克年輕世代的歷史意識有了明顯的轉變，或在他們社會經驗與教育裡逐漸去捷克化的結果，這都是在斯洛伐克新國家認同的架構下所產生歷史意識及歷史記憶的刻意遺忘，透過這樣的遺忘或許能讓斯洛伐克人在歷史經驗上獲得更多的自信與尊嚴。

表 5：歷史知識測驗

	問 題	答對 (%)
捷 克	捷克的絲絨革命是哪一年？	97.5
	捷克斯洛伐克（1918）的第一位總統？	99.5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的絲絨革命是哪一年？	94.2
	捷克斯洛伐克（1918）的第一位總統？	61.9

延續上文所述的歷史知識測驗，本問卷調查要受訪者回答在自己國家內（捷克及斯洛伐克）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捷克受訪者回答最多的事件是絲絨革命（1989），這與斯洛伐克受訪者回答絲絨革命的次序差不多。除了絲絨革命之外，捷克及斯洛伐克受訪者的其他答案則有不小差異。捷克年輕世代認為 191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獨立是相當重要的，斯洛伐克年輕世代則認為 1993 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才是最重要的，捷克受訪者認為捷克斯洛伐克關係的開始較重要，而斯洛伐克受訪者則認為捷克斯洛伐克關係的結束比較重要，這說明了國家認同的架構改變下，對歷史意識或記憶的重要性可以彈性調整。也因為國家認同架構的改變，捷克年輕世代強調的是捷克歷史發展的元素，包括改變捷克歷史命運的白山之役及三十年戰爭（1620）、改變捷克當代國家命運的慕尼黑協定（1938）及共產黨執政（1948）。斯洛伐克年輕世代也在新的國家認同架構下強調斯洛伐克的歷史元素，包括斯洛伐克語標準化運動（1843）及 Matice 民族主復興運動（1863），另外再強調歐洲化的元素如加入歐盟（2004）及使用歐元（2009），最後斯洛伐克還有重新檢討 Tiso 政權的重要性（1939-45）。

捷克受訪者從歷史事件中強調捷克斯洛伐克的關係，以及二個民族結合過程中的歷史進程，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獨立、共產黨執政、布拉格之春自由化運動、絲絨革命及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等，其次捷克受訪者較強調過去歷史的光榮與失敗，包括查理四世統治及白山之役。斯洛伐克的受訪者則強調的是以 19 世紀的民族復興及 21 世紀的歐洲化來解構 20 世紀與捷克在一起的歷史意識，因此我們從上述的這些表格來印證前述的理論架構：國家認同的框架建構了歷史記憶／意識的內容。過去我們對捷克及斯洛伐克的了解並不多，我們很訝異在歐洲整合的大環境下，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國家分裂竟然如此和平理性，我們可以地緣政治解釋二國並無領土糾紛、移民問題及重大歷史爭議等，所以二國和平分裂實屬當然，但從年輕世代的角度來探討二國的國家認同及歷史意識的變化，可以理解二國目前認同與記憶的差異性。

表6：您認為在捷克最重要的歷史事件

次序	事 件	次 數
1	1989 絲絨革命	126
2	1918 捷克斯洛伐克獨立	110
3	1620 白山之役及 30 年戰爭	61
4	1938 慕尼黑協定	46
5	1346-1378 查理四世時期	45
6	1948 共產黨執政	44
7	1968 布拉格之春及蘇聯占領	37
8	1945 二次大戰結束	34
9	1415 胡斯運動	34
10	1993 捷克斯洛伐克分裂	27
11	1914 一次大戰爆發	27
12	2004 加入歐盟	16

說明：1989 絲絨革命為推翻政權，實施民主化；1620 白山之役及 30 年戰爭為歐洲宗教戰爭，其首役發生在捷克布拉格；1938 慕尼黑協定，捷克遭受納粹德國併吞；1346-1378 查理四世時期，為捷克作為神聖羅馬帝國的核心地位；1968 布拉格之春為捷克斯洛伐克遭蘇聯佔領；1415 胡斯運動，為捷克進行宗教改革運動；1993 年捷克及斯洛伐克和平分裂。

表7：您認為在斯洛伐克最重要的歷史事件

次序	事 件	次 數
1	1993 捷克斯洛伐克分裂	41
2	1989 絲絨革命	35
3	1843 斯洛伐克語標準化	30
4	2004 加入歐盟	28
5	863 Cyria 及 Metodia 傳教	23
6	2009 使用歐元	18
7	1918 捷克斯洛伐克獨立	14
8	1944 SNP 反 Tiso 及納粹	13
9	1863 Matice 民族復興運動	6

說明：1843 年斯洛伐克語標準化說明了斯洛伐克的民族意識起源得相當早；863 Cyria 及 Metodia 為東羅馬帝國派到今日斯洛伐克境內，他們編撰了斯拉夫文字；1944 年為斯洛伐克人民於二次大戰期間，反抗與納粹德國合作的 Tiso 政權；1863 年 Matice 運動為斯洛伐克 19 世紀民族復興運動的重要一環。

斯洛伐克年輕世代以歐洲認同來建構國家認同，似乎更強調歐洲化的未來性，因此斯洛伐克受訪者在回答「您認為歷史知識及記憶在當今社會重不重要」的問題時也顯示跟捷克受訪者相當不同的「歷史」態度。斯洛伐克年輕世代認為非常重要及重要的比例僅有二成，捷克受訪者則高達七成二。綜合表 4 及表 8 來看，儘管斯洛伐克年輕世代的受訪者認為國家認同問題非常嚴重或嚴重（82.3%），以此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作為歷史記憶的框架，其衝突性是相當高的，因此斯洛伐克的年輕世代受訪者才大都不認為歷史知識及記憶具有重要性。相反地，捷克的受訪者有高度的國家認同，同時他們也認為歷史知識及記憶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本文論述至此或許仍難以斷定以歐洲認同做為國家認同的參考框架時，結果是否會造成斯洛伐克年輕世代的歷史記憶或意識的失落。我們再從表九來看，似乎也印證了斯洛伐克年輕世代比捷克年輕世代更缺乏歷史意識，在表九的幾個問題我們更理解了捷克及斯洛伐克年輕代的歷史態度，斯洛伐克受訪者有八成八左右同意「比起我們的長輩，年輕人比較不在乎歷史意識或記憶」，而捷克受訪者同意的比例為五成八；捷克受訪者有八成五的受訪者同意「紀念碑與紀念日有歷史意義的價值，所以要保留與闡揚」，然而斯洛伐克受訪者僅有一成七；斯洛伐克受訪者有高達八成八的比例認為「我們過去的歷史大多是悲情，所以我們要忘掉歷史，向前看」，捷克受訪者幾乎都不認同這點。

表 8：您認為歷史知識及記憶在當今社會重不重要（%）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非常重要	37.5	3.0
重要	34.5	17.0
普通	25.0	27.3
不太重要	2.0	47.7
非常不重要	0	3.3
不知道	1.0	1.7

表 9：您是否同意以下有關歷史記憶的看法 (非常同意 + 同意) (%)

	捷 克	斯洛伐克
重視歷史古蹟的保存	75.2	45.6
我們社會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集體記憶	34.8	70.9
比起我們的長輩，年輕人比較不在乎歷史意識或記憶	57.7	87.6
紀念碑與紀念日有歷史意義的價值，所以要保留與闡揚	84.6	16.4
我們過去的歷史大多是悲情，所以我們要忘掉歷史，向前看	2.0	87.7

至此，我們論述了捷克及斯洛伐克國家認同的架構與歷史記憶或意識建構的關係，在共產統治時期的歷史建構來自官方政治教育，有政治正確性的考量，歷史記憶做為國家統治的工具而存在。民主化之後的歷史教育以及歷史意識的獲得管道較為多元，不過仍以來自學校的歷史教育仍是最主要的，其他歷史記憶或歷史意識的方式也包括「課外書籍、雜誌及報紙等」、「電子媒介（如電視、廣播電台、網路資訊等）」、「參與政治性或社會性的運動」及「參與課外活動方式（如夏令營等）」等。此外，斯洛伐克受訪者（16.3%）回答他們透過旅行及參訪活動來獲得歷史知識來源的比例遠低於捷克受訪者（71.6%），斯洛伐克受訪（4.7%）者從日生活中來自父母集體記憶的比例也比捷克受訪者（低 29.4%）。從表 10 的歷史知識來源中，我們了解在民主化時期的歷史記憶建構管道是多元的，然而在國家認同的框架上，我們也發現捷克及斯洛伐克年輕世代的歷史記憶是有框架的限制效果。

表 10：請問您的歷史知識來源 (%)

	捷 克	斯洛伐克
學校授課	96.0	97.0
課外書籍、雜誌及報紙等	78.1	75.4
電子媒介（如電視、廣播電台、網路資訊等）	79.6	74.1
旅行及參訪（如博物館、名勝古蹟等）	71.6	16.3
參與政治性或社會性的運動	8.0	10.6
參與課外活動方式（如夏令營等）	10.9	21.3
日常生活中的集體記憶（父母）	29.4	4.7
其他	6.5	0.3

陸、結論

捷克及斯洛伐克擁有共同的「過去」，但不代表他們有相同的歷史論述。根據本研究結果，筆者認為「國家認同」的框架是主要影響歷史記憶及歷史意識的重要外在條件。斯洛伐克在後共產時期尋求的是去捷克化的國家認同途徑，取而代之的是以歐洲認同作為建構框架，歐洲未來性提供斯洛伐克年輕世代更為寬廣的發展空間，但也讓年輕世代的國家認同更形迷網。捷克的國家認同並未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框架有太多的衝突，因此不存在去斯洛伐克化的國家認同建構途徑，反而在歐洲認同上抱持著更多的質疑態度，並讓歐洲認同與歐洲懷疑論並存地提供國家認同更多反思的空間，因此捷克年輕世代的國家認同外觀上比較清晰。

1918年捷克及斯洛伐克民族建構一個從不存在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國家認同，經過75年的磨合期間，雖然二個民族有其自尊心與民族歷史感的考量，而有更改國號或政策執行上的不同，但畢竟缺少地緣政治上領土、民族與經濟利益的重大衝突，捷克與斯洛伐克中就在1993年和平分裂，分裂之後仍能和平理性相處，二國新任元首都以對方為拜會首站做為曾經是兄弟國的傳統友誼象徵。今日在斯洛伐克境內的匈牙利裔人口仍有60幾萬，他們往往成為斯洛伐克與匈牙利外交衝突的來源。斯洛伐克人在捷克的移民有七萬多人，但二國人民仍有很深的情誼，因此能和睦相處。1993年的絲絨分裂創造了捷克民族國家與斯洛伐克民族國家，這是承接19世紀中東歐民族復興運動的結果，或許對捷克及斯洛伐克二個民族而言，這晚了75年的民族運動結果也是19世紀的延伸作用，若無這75年的合作效果，很難保證二次大戰或冷戰期間這二個民族又會消解到哪個「新帝國」去。只不過在分裂之後，比較弱勢的一方勢必又要在解構強勢的一方基礎上建構屬於自己的身分認同，這就是斯洛伐克在絲絨分裂之後的寫照。

歷史學與社會學的科際整合在於某些議題的研究上或許更有解釋力，歷史社會學本身就是社會學的重要傳統，甚至涂爾幹也以實證的資料來印證自殺現象，從而論證社會變遷中的秩序議題，馬克斯更以自認的科學觀來檢視人類歷史發展的各階段。過去歷史社會學者論證的是大歷史的演變

與發展，在當代全球化、後工業及後現代的思潮主流下，大歷史轉化為許多的個人故事言說，論述著大時代下的專制不正義及懷舊的消費型故事，歷史的地方化與小眾化引領著個人記憶的多元發展，讓歷史記憶從生活化當中建構及對社會生活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歷史記憶再現的管道是大眾化的電子媒體（電視、電影、網絡視頻等）及歷史遺產（紀念碑、博物館及歷史老街等）等，歷史與社會生活的結合更形緊密，但歷史商品化及消費意識也不斷成為我們生活的組成，我們在全球化的時代裡再談國家認同及歷史記憶時，雖然缺少歷史意識形態及激情，但仍應該認知這樣的議題還是有必要研究，甚至態度仍需要嚴肅。假如斯洛伐克年輕世代的歷史記憶有如本研究調查結果所述，在目前仍是以民族國家單位組成的國際體系／全球體系，他們的未來性是否還是如此樂觀？

本文最後的結論是，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共同過去結果創造出不同的歷史記憶，中間變項就在國家認同這個框架作用，斯洛伐克在去捷克化的國家認同架構裡，試圖以「歐洲認同」取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框架，如此讓斯洛伐克年輕人更積極尋求外再發展的機會，但也對國家認同的內涵有更多的質疑。反觀捷克在無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情結，以及對歐洲認同持有一定的懷疑論之下，捷克的國家認同及歷史記憶的相互證成比較少有衝突。在全球化下的民族主義發展，除了極端的種族主義之外，國族認同仍是社會生活的必然組成，歷史記憶與國族認同以後現代的多元形式存在日常生活裡，已成為歷史學與社會學的科際整合議題。就社會學而言，對歷史議題的社會學研究，包括實證研究方式，都是回歸社會學傳統的方式。

參考書目

- Agnew, Hugh. 2004. *The Czechs and the Lands of the Bohemian Crown*.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Anderson, Benedic (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台北：時報出版。
- Assman, Aleida. 2008.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Social Research*, No. 75, pp.49-72.
- Berend, Ivan T. 2003. *History Deraile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ke, Peter (江政寬譯)。2002。〈歷史學與社會理論〉。台北：麥田出版。
- Cornej, Petr, and Jiri Pokorny. 2004.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zech Lands to 2004*. Prague: Praha Press.
- Coser, A. Lewis (孫立平等譯)。1991。〈社會衝突的功能〉。台北：桂冠圖書。
- Dowling, Maria. 2002. *Brief Histories: Czechoslovakia*. London: Arnold
- Gellner, Ernest (李金梅等譯)。2001。〈國族與國族主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Halbwachs, Maurice (Lewis A. Coser, trans.).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zlett, John D. 1992. "Generational Theory and Collective Autobiography."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Vol. 4, No. 1, pp. 77-96.
- Innes, Abby. 2001. *Czechoslovakia: The Short Goodby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Jenkins, Keith (賈士蘅譯)。2009。〈歷史的在思考〉。台北：麥田出版。
- Kirschbaum, Stanislav J. 1995. *A History of Slovaki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eff, Carol Skalnik. 1997.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 Nation versus Stat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Mannova, Elena. 2000. *A Concise History of Slovakia, Bratislava*. Bratislava: Historicky ustav SAV.
- Musil, Jiri. 2000. *The End of Czechoslovaki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Panek, Jaroslav, and Oldrich Tuma. 2009. *A History of the Czech Lands*. Prague: Karolinum Press.
- Polisensky, J. V. 1991. *History of Czechoslovakia in Outline*. Prague: Bohemia

International.

Wandycz, Piotr S. 1992. *The Price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Routledge.

Ward, Thomas Klimek. 2000. *People of the Word: A Synopsis of Slovak History*. Slovakia: Matica Slovenska.

蕭阿勤，2008。〈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政治文化變遷〉。台北：中研院社研所。

The Collective Memory Framework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Identity Differentiati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after the Breakup of Czechoslovakia

Ter-Hsing Che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Chia-Min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Czech and Slovakia nations established a common countr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but peacefully divided after 75 years of coexistence (1918-1993). Afterward, Czech and Slovakia republics chose different paths to construct new national identities. Slovakia took “European identity” as the construction framework of national identity, while Czech stressed the “European suspici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of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acquire different historical memories under the new national identities. Therefore, although the new generations face the “common past,” they alread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In addition, due to the lack of geopolitical conflict and no major historical disputes, the new generations of Czech and Slovakia republics do not treat each other as the unfriendly countries under the diverge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memory.

Keywords: younger generation, national identity, historical memory,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Republic